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

文学的双重变革

付建舟 / 胡全章 著

——
清末民初文学史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变革



付建舟

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入选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151人才第二层次，荣获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人文社科类）二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多种奖项，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重点一项），已出版《近现代中国文论的转型》《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等专著十余部，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文哲研究通讯》《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



胡全章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中国近代文学史》主讲教师。出版《清末白话文运动》《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等学术著作6部，发表《晚清与“五四”：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等学术论文90余篇，参撰《中国近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教材。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

文学的双重变革

——清末民初文学史

付建舟 胡全章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双重变革:清末民初文学史 / 付建舟, 胡全章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0.1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 / 高玉主编)
ISBN 978-7-5178-3614-8

I. ①文… II. ①付… ②胡… III. ①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史 IV. ①I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76919 号

文学的双重变革——清末民初文学史

WENXUE DE SHUANGCHONG BIANGE — QINGMO MINCHU WENXUESHI

付建舟 胡全章 著

策划编辑 郑建
责任编辑 郑建
封面设计 王辉 张俊妙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庆春籍研室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3 千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3614-8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总 序

当今文学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本科教育是这样，研究生教育也是如此。在学科分类和学术研究中，文学史都是文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没有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涵盖或牵涉所有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所以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材编写，文学史都将是说不完的话题，文学史作为教材“常编常新”，作为学术“常研究常新”。

大约从 2008 年起，我和同事们有意编一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并且希望有所突破和创新。这种突破和创新不仅体现在教材内容上，也体现在体例上。我们也希望这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有所推进，避免各种陈陈相因。我发现，很多教材之所以陈陈相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纂者缺乏对他书写内容的深入研究，因而多是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我们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教材编写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以此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这个项目，并于 2015 年申请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获得通过（编号 2014GH006）。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或“新文学”）“时间段”划分及其模式的问题。虽然说中国新文学发展至今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就时间而论其无法与古代几千年的文学史相提并论，但这百余年与古代的任何一百年都不一样，就其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内容的丰富性（如涉及的材料、文学现象、文化背景交融等）、矛盾的多重性（古/今、中/外、城/乡、传统/

现代等)、作家作品数量上的巨大性(21世纪以来,仅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数千部之多)等特征而论,它是全新的类型和品质,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古代断代文学史式的简单叙述不同,需要一种新的研究方式。

同时,百年来的新文学本具有一体性,把它简单地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是适合的,在今天则完全不合适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内容上的严重不平衡。现当代文学史在发展上是“自由落体运动”式的,也即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品在量上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增加的,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密度”很大,内容非常丰富且复杂,但在文学史的版图里却被“压缩”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现代文学仅30年,而当代文学已有70年,且时间上还在向前延伸,这不仅在时间上不平衡,在内容上更不平衡。当代文学内部,由于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加上巨大的差异性,笼统地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不可能,笼统地研究当代文学也不可能,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需要分工协作,需要分“时间段”来研究。

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新文学经历了多次转型,其中既有晚清以降传统向现代的新旧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当代转折,以及70年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裂变等这样具有“知识型”层面的大的转折,也有像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生发展、20—30年代的新文学繁荣、40年代初至1949年的文学发展的区域性分割、“文革”前后文学演变的反转、80年代文学的盛世想象、90年代文学的“大转型”等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的时段。如此种种,使得以发展阶段为基础,对其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史”的研究,成为必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既需要宏观的演变研究,也需要更为细致甚至琐碎的“横断面”的“解剖性”研究。

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初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它的合理性,它意味着一种不同于过去三千年文学的新文学的开始,但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具有独立性,现代文学在实绩上的确具有巨大成就,伟大作家群星闪耀,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宏观时期越来越

文学的 双重变革

—— 清末民初文学史

越不合适，它甚至没有纯粹属于自己时代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多跨两个时代，或者从晚清到民国，或者从现代到当代，没有跨越时间之外的叙述，这些作家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正是从“完整”的角度，本丛书专著“清末民初”文学一册。我相信，将百余年文学发展的自然时段作为分段的依据，这既是一种分期法和对约定俗成的文学现象的认知，也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体现。这一体例既能有效避免在现代和当代之间人为强制地划定界限，避免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各自复杂性的化约，也能更为详细地梳理百年文学的纹理脉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百年文学的历史走向。

高玉

2019年10月23日于浙江师范大学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	
第一节 清末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建树.....	004
第二节 清末民初报章白话的语言面貌及其流变.....	014
第三节 清末民初报章白话文的文体形态.....	023
第四节 白话文运动：清末至五四.....	030
第二章 蜕旧变新的新小说	
第一节 发表政见的政治小说.....	040
第二节 五彩缤纷的社会小说.....	054
第三节 以史为鉴的历史小说.....	066
第四节 “言他”与“言情”的言情小说.....	074
第五节 进取与堕落的“女界小说”.....	084
第三章 戏剧改良与新潮演剧	
第一节 春柳社及其启蒙新演剧.....	099
第二节 春阳社及其启蒙新演剧.....	111
第三节 进化团及其职业化的新演剧.....	119
第四节 新民社与民鸣社及其商业化新演剧.....	128
第五节 新潮演剧的历史功绩.....	140

第四章 新旧诗歌的起伏消长

- 第一节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 154
- 第二节 诗界革命的代表诗人 165
- 第三节 转型期的同光体诗派 190
- 第四节 转型期的南社及其诗歌 209

第五章 各具特色的诸体散文

- 第一节 康有为的政论文 226
- 第二节 严复的政论文与古文 233
- 第三节 谭嗣同、梁启超的新体散文 239
- 第四节 章太炎的论战文与述学文 245
- 第五节 章士钊的论战文与逻辑文 254
- 第六节 林纾的古文 263

第六章 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的发展概况 270
- 第二节 林纾与林译小说 276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周氏兄弟的翻译文学 284
- 第四节 清末民初其他翻译文学 295

参考文献 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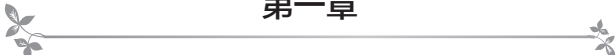
后 记 308

文学的双重变革

清末民初文学史


绪 论

清末民初文学呈现双重变革态势，即衰变与新变：一方面旧的文学虽然逐渐衰退，然而由于其势力还十分强大，加上或多或少地吸收一些新的因素，因而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新的文学虽然不断萌生、发展和壮大，然而由于传统的因素难以全部剔除，势力又相对弱小，新旧文学之激战持续不断，即使在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涨时期也是这样。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



清末出现的白话报刊有 270 多种，以《大公报》为代表的 50 余种文言报辟有白话栏目或赠阅白话附张，另外尚有为数众多（300 多种）的文字浅易的蒙学报、浅说报、女报、配有白话解说的通俗画报等，加上几十种以刊载白话小说为主的文艺杂志和大量行世的白话教科书、白话文告、新小说等，以及改良戏曲和成为时代风尚的白话演说潮流，形成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其出现和发展不仅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不能忽略的一环，更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前驱。

第一节 清末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建树

清末白话文运动先驱已经有了自觉的白话理论，而且清醒地认识到古今中外语言文学发展史莫不循着“语言文字合一”之趋向演进；“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学进化发展的“一大关键”和必然趋势。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无疑继承了清末启蒙先驱的白话语言工具观念和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



黄遵宪

一、维新派启蒙先驱的白话(文)理论

早在 1887 年，黄遵宪就在《日本国志》中参照日本国语运动经验，明确提出言文合一主张：“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1] 他深谙泰西各国及日本语言文字和文学变革发展之大势，敏锐地意识到语、文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一条路径，并寄希望于他日“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2] “适用于今”提出了文体语体的近代化变革要求，

[1]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二·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6页。

[2]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二·文学》，第347页。

“通行于俗”指出了文章语言变革的社会化路径。黄氏提出的语文必须合一、行文必须“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要求，开清末和五四白话文运动理论先声。

1896年，梁启超作《沈氏音书序》，视“民智”为“国强”之根基，视言文合一为开民智之必要手段与途径。梁氏认为：“古者妇女



梁启超

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当时之语言也。”^[1]他对“后之人弃今言不屑用”之现象和起于秦汉以后的“文言相离之害”痛下针砭，认为这是“中国文字能达于上”而“不能逮于下”的症结所在。这是在为提高“今言”的社会文化地位寻找历史根据。梁氏意欲在“美观而不适用”的“文”和“适用而不美观”的“质”之间，寻求一条“文质两统不可偏废”的语文革新路径。

1897年初，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将语文合一目标明确指向了“俚语”。梁氏极言“俚语”对于社会变革、移风易俗的重大意义，称：“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2]

尽管黄遵宪和梁启超并未明确打出白话文旗帜，然而由于白话文既符合黄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革新目标，又符合梁氏“文与言合”的语文革新路径，提倡白话写作已是其语文合一思想题中应有之意。



袁廷梁

1898年8月，袁廷梁发表《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战略口号，标志着白话文运动理论自觉阶段的开始。他将国家危亡之因归结为国无智民，将民智不开之因归结为“文言之为害”；从语言文字发展史和古人对文字的运用等方面说明“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指出文字诞生时本与语言一致，后人不明祖先创造文字为实际应用之

[1]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页。

[2] 梁启超：《论幼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54页。

初衷，一味模仿古人言语，致使“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1]。文章列举省日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力、少弃才、便贫民“白话”的八大益处，将泰西诸国人才繁盛横绝地球之因归结为“用白话之效”，将区区数小岛之民而皆有雄视全球之志的日本之崛起，亦归结为“用白话之效”，从而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2] 裘文以一种激进姿态首次对两千年来的“文言之为害”进行了认真清算，正式揭开了20世纪“文言与白话之争”的历史序幕。裘氏把“白话”提高到“维新之本”的时代高度来认识，将“兴白话而废文言”与国家民族兴亡联系起来，可谓清末“白话文运动急先锋”^[3]。他标榜“白话胜于文言”，把言文一致、朴质天然的白话提高到语言美的高度来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文学层面。其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表在“百日维新”高潮期，后被《苏报》《清议报》转载，得到了维新派阵营的认可与支持，对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影响甚巨，成为清末白话文运动的指导纲领。

康门弟子陈荣袞亦是白话文运动理论的前驱。1897年，其《俗话说》一文劈头就说：“讲话无所谓雅俗也”，“今日所为极雅之话，在古人当时俱俗话也。今日所谓极俗之话，在千百年后又谓之雅也”。^[4] 陈氏对语言雅俗之分提出质疑，对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重雅轻俗观念予以针砭，明确倡言“俗语”，对提高白话地位起到积极作用。语言雅俗界限的打破，对俗文学的兴起并最终取代雅文学的正宗地位创造了条件。1900年初，陈氏《论报章宜改用浅说》刊于《知新报》，继续宣扬“论说无所谓雅俗”观点，将“改革文言”视为开民智之法宝，视接近口语的“浅说”为报章应采用的唯一文体。他痛陈“文言之祸亡中国”，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5] 他通过对中日报纸数量和销量

[1]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官音白话报》第19、20期，1898年8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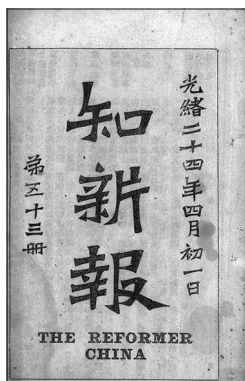
[2]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官音白话报》第19、20期，1898年8月27日。

[3] 谭彼岸：《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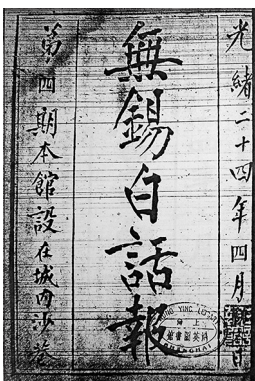
[4] 陈荣袞：《俗话说》，《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5] 陈荣袞：《论报章宜改用浅说》，《知新报》第111册，1900年1月11日。

多寡及原因之分析，得出中国报纸不广大之根由在于其多用文言，日本报纸多、民智开、国富强之因在于其报章多用浅说。这一轻“文”重“质”的“浅说”导向，对清末报章文体通俗化产生较大影响，既为一大批文话报指出了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浅说”一途，又为此后出现的众多白话报、浅说报、通俗报、女学报、妇孺报、蒙学报等预设了话语方式。



《新知报》第三十三册



《无锡白话报》第四期



《中国官音白话报》第65期

清末汉语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是一对孪生兄弟，“普及教育”和“言文合一”是其共同目标。拼音化运动倡导者积极展开了各种宣传推广活动，在壮大自己声势的同时，也给予白话文运动很大助力。1903年底，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六人联名上书总督袁世凯，要求“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其所提出的五项办法，分别为“设师范学堂”“立演说会”“出白话报”“编白话书”“劝民就学”。^[1]“出白话报”一项言：

民情顽固，国家一切政治皆无从措手，朝野上下，划然两截，宜乎？政治风俗，尔为尔，我为我也。今欲开通风气，宜如何而后民始难惑？如何而后民始易晓？是非使人人阅白话报不为功。白话报者，以一人之演说能达之千万人，行之千万里之利器也。不必强人人必阅，要必使人人能阅。

[1] 《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35—39页。

夫至人人能阅，虽禁之不阅，不可得矣！^[1]

这一提议得到了袁氏的赞助和支持，扩大了其社会影响。此后，拼音化运动、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虽并非同道，却相辅而行，最终在五四时期汇流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之下，形成了双潮合一之观。

著名报人英敛之也是白话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实践者。1904年3月26日，英敛之在《大公报》“附件”栏发表了《开通民智的三要策》，第一要策是“通行白话”，提出“凡是蒙小学堂的教科书，全用白话编成，不必用文话。就是中学堂大学堂的文理，也当改革，但求明白显豁，不必远学周秦”。第二、第三要策分别是“通行新字”“实施强迫的教育”。英氏预言：“有办此事之权的，倘照这三个法子办去，将来的功效，必有不可思议的”，“用不了十年，国家文明进步，必不可限量”。1920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统一运用语体文。英敛之的倡议，比这一政令早了16年。



《大公报》与英敛之

二、革命派知识精英刘师培的白话文(学)理论

庚子国变后，亡国灭种危机空前严重，清廷颓废面目暴露无遗，知识阶层对民智不开酿成的恶果有了切肤之痛，志士仁人则更加认定了政府不足与图治，于是革命风潮大盛。许多革命志士以白话文(学)为载体，以报刊为阵地，以激进的姿态加入了清末白话文运动的时代大合唱。他们的加盟，为白话文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壮大了队伍和声势，也提供了新的理论建树。其中，刘师培成绩最显著。

1903年，刘师培在《中国文字流弊论》中指出了中国文字的五大弊端，提出两项革新措施，其一曰“宜用俗语”，其二曰“造新字”。^[2]同年，他在《国文杂记》中痛诋“中国国文之弊正坐雅俗之

[1] 《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38页。

[2]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40页。